

城乡社会“断裂”与 “人口逆淘汰”再思

李建新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北京 100871)

【摘要】“人口逆淘汰”问题在人口学研究中已有明确的结论,但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仍有进一步思考的余地。在梳理人口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从城乡社会“断裂”的社会学角度,对“人口逆淘汰”问题进行再分析、再思考。城乡人口素质差异等“社会统计事实”背后,是城乡社会“断裂”的现实。制度因素如户籍制度和教育健康资源占有与配置等结构因素深刻影响了我国人口素质的提高。

【关键词】人口逆淘汰;城乡二元结构;人口素质

【中图分类号】C92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29X(2010)01-0003-07

【收稿日期】2009-06-24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关于将提高人口素质作为解决未来我国人口与发展问题的主要战略措施之一的综合研究(2006JDXM239)

【作者简介】李建新,男,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关于“人口逆淘汰”的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末被学者提出、讨论以来,^[1-4]一直是一个较敏感的话题。进入21世纪,这个问题依然“时隐时现”,挥之不去,而且不时地透过公众平台、公众媒体如人代会、报刊等不断地进入公众和学者的视野。从人口学的角度看,这个问题近来已有明确的结论,^[5]即这只是前提不存在的“假说”。但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仍有进一步思考的余地,仍需要透过问题的表象分析这个问题提出的背后“忧虑”。所以,本文在梳理人口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从城乡社会“断裂”的社会学角度,对“人口逆淘汰”问题进行再分析、再思考。

一、城乡二元结构的人口素质差异

人口素质,也称人口质量。人口学所讲的人口素质一般指的是人口总体的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以及思想素质,它反映了人口总体认识和

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6]从人口学的定义上看,人口素质包括三个方面,但因为思想素质不易测量且可比性较弱,所以关于人口素质概念,学界素有“二元观”和“三元观”之分,前者只包括健康素质和教育素质,后者则还包含了思想素质或道德素质。人口素质具有生物和社会双重属性,前者取决于生物遗传因素,后者取决于社会环境因素。一般人口学所讨论的人口素质主要着眼于人口的健康素质和教育素质,在这里健康与教育均具有人口的自致特征(population achieved characteristics),而不涉及其先赋特征(Ascribed characteristics)。这些自致特征直接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实力、教育、卫生医疗发展水平及其制度有关。下面我们从健康与教育两个方面考察我国城乡人口的素质变化。

衡量一个人口健康素质的指标之一是婴儿死亡率。婴儿死亡率的高低直接与这个人口的医疗

水平、妇幼保健条件有关,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健康条件的敏感指标。表 1 给出了我国部分年份城乡人口的婴儿死亡率。可以看到,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婴幼儿死亡率都在不同程度地下降。但是,城乡差异始终存在且差距不小。2004 年,乡村婴儿死亡率为 24.5‰,高于城市 1 倍多;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农村为 28.5‰,高出城市 16 个百分点。这些健康指标的城乡差异反映了城乡人口健康素质的差异,同时也反映了城乡人口医疗卫生条件的差距。

表 1 我国监测地区分城乡的婴儿死亡率(‰)

| 年份 | 婴儿死亡率 | | | 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 | |
|------|-------|------|------|-----------|------|------|
| | 合计 | 城市 | 农村 | 合计 | 城市 | 农村 |
| 1991 | 50.0 | 17.3 | 58.0 | 61.0 | 20.9 | 71.1 |
| 1995 | 36.4 | 14.2 | 41.6 | 44.5 | 16.4 | 51.1 |
| 2000 | 32.2 | 11.8 | 37.0 | 39.7 | 13.8 | 45.7 |
| 2004 | 21.5 | 10.1 | 24.5 | 25.0 | 12.0 | 28.5 |

资料来源:卫生部,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2006[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

另一个综合反映人口健康的指标是平均预期寿命,这一指标与人口的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直接相关。表 2 数据显示,总体上看,我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在不断提高,从 1982 年至 2005 年抽样调查显示,我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提高了近 8 岁,处于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城乡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差距明显,而且,20 多年来城乡平均预期寿命的差距没有实质性缩小,始终维持着 5 岁左右的差距。

表 2 我国分城乡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

| 年份 | 全国 | 城镇 | 乡村 |
|------|-------|-------|-------|
| 1982 | 67.88 | 70.87 | 65.79 |
| 1990 | 68.55 | 71.83 | 67.13 |
| 2000 | 72.43 | 76.14 | 70.63 |
| 2005 | - | 78.60 | 73.61 |

资料来源:翟振武,侯佳伟.人口逆淘汰:一个没有事实根据的假说[J].中国人口科学,2007,(1):10-18

反映人口素质的另一个维度是人口的文化教育水平。总体上看,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很快,人口的教育素质不断提高。历次普查资料表明,我国人口的文盲率迅速下降,人均受教育年限在不断提高。从 1982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到 2000 年第五次普查,我国 15 岁及以上人口的文盲率由 22.8% 降到 6.7%,人均受教育年限也由 5 年提高到了接近 8 年。可以说我国文化教育事业伴随着改革开放、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从城乡二元结构去观察,城乡人口的教育素

质差异依旧很明显。如 2000 年普查,乡村人口文盲率仍高于城市 4 个百分点;乡村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不足 7 年,低于城市人口 9 年的平均水平,这些差距反映了城乡人口教育素质的差距。

表 3 我国分城乡人口的教育水平

| 年份 | 全国 | | 城镇 | | 乡村 | |
|------|-------|---------|-------|---------|-------|---------|
| | 文盲率 | 人均受教育年限 | 文盲率 | 人均受教育年限 | 文盲率 | 人均受教育年限 |
| 1982 | 22.81 | 5.20 | 16.82 | 7.12 | 24.36 | 4.68 |
| 1990 | 15.88 | 6.24 | 9.19 | 7.98 | 18.26 | 5.60 |
| 2000 | 6.72 | 7.58 | 4.09 | 8.97 | 8.26 | 6.76 |

资料来源:同表 2。

除了城乡之间存在着人口健康教育素质的差距,地区之间尤其是东、中、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及人口素质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由于自然地理、社会经济基础条件以及相关政策的原因,我国的中、西部许多地区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而且这些欠发达地区又多是农村地区,这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表 4 可以看到,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如人均 GDP、非农产业发展以及人口健康教育素质的投入如文教人均支出等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而且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到本世纪还有扩大的趋势。可以说,从一定程度上讲我国东、中、西地区之间的差距与城乡社会之间的差距是重合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我国东、中、西部的发展差距特别是东部与西部的差距视为广义上的城乡之间的差距。

表 4 东、中、西三大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主要指标比较

| 指标 | 年份 | 东部 | 中部 | 西部 |
|--------------|------|------|----|------|
| 人均 GDP | 1990 | 1.62 | 1 | 0.86 |
| | 2002 | 2.08 | 1 | 0.79 |
|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 1990 | 1.40 | 1 | 0.92 |
| | 2002 | 1.57 | 1 | 0.81 |
| 非农产业比重 | 1990 | 1.16 | 1 | 0.97 |
| | 2002 | 1.09 | 1 | 0.97 |
| 城乡居民人均文教娱乐支出 | 1990 | 1.51 | 1 | 0.85 |
| | 2001 | 1.56 | 1 | 0.91 |
| 城乡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 | 1990 | 1.21 | 1 | 0.79 |
| | 2001 | 1.60 | 1 | 0.93 |

资料来源:陈立,马力.人口和计划生育常用数据手册[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6:17.

二、“人口逆淘汰”问题的兴起与争论

以上各项人口统计指标表明,我国城乡、东部与中、西部在社会经济发展、人口的健康素质和教

育素质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这些“社会统计事实”加上长期以来我国城乡实施不同生育政策的现实即城市严紧、乡村宽松正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至今学者及有关部门不断提出“人口素质逆淘汰”问题的背景和基础。

20 世纪 90 年代兴起了有关“人口素质逆淘汰”的讨论。需要说明的是,关于“人口素质逆淘汰”的讨论,基本上是围绕着人口素质二元论展开的,即围绕着人口的健康和教育素质展开。在这场讨论中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坚持我国人口总体素质出现了“人口逆淘汰”者认为,我国现行的城市严紧、乡村宽松的生育政策造成了如下事实:在较优环境中(如城市)的具有较高素质(如健康好、高教育)的人口再生产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而在较差环境中(乡村)的较低素质(相对较低的健康和教育水平)的人口的迅速增长却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这样的结果意味着我国人口总体素质在逐渐恶化。“人口逆淘汰”论者的逻辑是,因为存在着城乡差别和地域差别的计划生育政策,而这些差别政策导致了农村人口增长快于城市,导致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断上升;而又由于农村人口低素质的状况,农村人口比例上升的结果最终造成了全国人口整体素质不断下降。^[1-2]

针对“人口逆淘汰”的观点,一些学者进行了反驳。一方面,他们认为“人口逆淘汰”的论证存在很多问题,如分析方法、数据使用不匹配等问题。他们认为,周孝正等人的分析文章,是以动态方式考察人口数量变化,却以静态数据进行人口素质的比较。只是将数据做一个简单的对比,而没有放到一个过程中去加以考虑,因此,这样的结论很难有说服力。此外,他们通过对城乡相对生育率变化的分析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即差别的人口生育政策并不是导致“人口素质逆淘汰”的原因,相反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人口政策起到减缓“人口素质逆淘汰”的作用。^[3-4]

进入 21 世纪,“人口逆淘汰”的话题不仅没有终结,反而透过公众平台如人代会上代表提案、公众媒体如报刊等不断地进入公众和学者的视野。针对“人口逆淘汰”问题持续不断地被提出,一些学者在梳理“人口逆淘汰”的各种观点之后,以历次普查数据为事实基础,再次论证了我国从实施城乡有差别的计划生育以来,不仅没有扩大城乡和地域生育水平差别,反而缩小了城乡生育水平的差别;同时由于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城镇化

速度加快,城镇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并没有出现所谓高素质的城镇人口比重不断下降的趋势;更重要的是,农村人口的健康教育素质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也在不断提升,从而成为推动全国人口整体素质上升的重要力量。这些事实非常有力地反驳了“人口逆淘汰”论者。因此,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关于中国人口素质正处在逆淘汰过程的说法,在理论上站不住脚,也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它只是一种前提并不存在的“假说”。^[5]

三、城乡社会“断裂”与“人口逆淘汰”问题再思考

从某种意义上讲,正如一些学者论证的所谓“人口逆淘汰”问题是一个“假问题”。但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兴起至今的有关“逆淘汰”问题的质疑和讨论有没有更深刻的社会学意义呢?关于这一点需要我们进一步讨论。

1. “人口逆淘汰”成立的条件

首先我们不妨看看在什么样的人口条件下,上述讨论的“人口逆淘汰”现象会出现。对于一个人口总体来说,从人口结构的视角观察,它都是由不同特征的部分人口组成的。对于我国人口来说,由于存在特有的户籍制度,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异,所以城乡地域特征是一个非常明显划分人群的标准。按照人口的地域结构,我国总人口可划分为城镇人口与乡村人口两部分。总人口等于城镇人口与乡村人口之和,即 $P(\text{总人口}) = P(\text{城镇人口}) + P(\text{乡村人口})$ 。基于上述列举的“统计事实”,我们已经知道,我国城乡在人口健康和教育水平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即城镇人口的健康和教育素质高于乡村人口。与此同时,城乡还存在着生育水平的差异和不同的生育政策,即城镇人口的生育水平低于乡村人口,城镇人口的生育政策严于农村人口。如长期以来我国大部分城市人口实施的是“一孩”生育政策,而多数农村地区实施的是“一孩半”或“二孩”生育政策。当存在这些城乡“差异”事实的时候,会不会出现所谓的“人口逆淘汰”呢?

首先我们不妨借用曾毅教授所做的预测结果(见表 5),看看不同人口流动条件下城乡人口的变动趋势。当不存在乡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迁移流动,即城乡人口互为封闭人口,且乡村生育水平高于城镇时,总体人口的内部结构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城镇人口比重越来越小,乡村人口比例越来越

大。套用“逆淘汰”的讨论语言,那就是在总人口中,高素质的城镇人口比例越来越小,而低素质的乡村人口比例越来越大,这正是前面讨论由于生育政策、生育水平不同而导致的“逆淘汰”现象的结论。但是仅有城乡人口封闭和生育率差距的假设还不能导致总人口中低素质的人口比重不断上升的结论,除非我们进一步假定乡村人口的低素质状况维持不变。从动态数据我们还看到,无论是城镇还是乡村,人口的健康素质和教育素质都在不断地提升。

至此我们发现,出现所谓“人口逆淘汰”现象

表 5 有无人口 城镇化方案的我国城乡人口变化(亿,%)

| 年份 | 无农村向城镇的人口迁移 | | | | 有农村向城镇的人口迁移 | | | |
|------|-------------|------|-------|--------|-------------|-------|-------|--------|
| | 农村 | 城镇 | 全国 | 城镇人口比例 | 农村 | 城镇 | 全国 | 城镇人口比例 |
| 1987 | 6.74 | 3.94 | 10.68 | 36.9 | 6.74 | 3.94 | 10.68 | 36.9 |
| 2000 | 8.39 | 4.85 | 12.97 | 35.3 | 6.45 | 6.45 | 12.89 | 50 |
| 2020 | 10.32 | 5.02 | 15.34 | 32.7 | 5.98 | 8.98 | 14.96 | 60 |
| 2050 | 12.2 | 4.7 | 16.9 | 27.8 | 3.11 | 12.46 | 15.57 | 80 |

资料来源:曾毅.人口分析方法与应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243.

然而,没有出现所谓的“人口逆淘汰”现象,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影响我国人口素质提高的各种因素。事实上,由于我国长期存在着二元户籍制度,以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政策差异,形成了城乡社会经济结构性差异,而这些差异又进一步影响了城乡人口健康素质与教育水平的提高。历史原因和现存制度的不合理性造成了教育健康资源和教育健康机会在城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如绝大多数的教育资源和医疗卫生资源都分布在城市,与占人口 60% 比例的农村形成了巨大反差。可以说,制度因素如户籍制度和教育健康资源占有与配置等结构因素深刻影响了我国人口素质的提高。一方面,现存的户籍制度阻碍了城乡人口之间的流动,这种流动不仅仅是城市和乡村空间地域之间的“水平流动”,更是城市和乡村社会经济地位差距的社会向上的“垂直流动”。另一方面,健康教育资源的不合理配置也大大地制约了乡村人口素质的全面提升。

从制度层面、公民权利以及社会公平的社会学视角反思和检讨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机制以及城乡二元结构如何影响城乡人口素质二元结构,比简单地讨论“人口逆淘汰”现象要更加深刻。或许按照人口学定义,我国并不存在所谓的“人口逆淘汰”现象,但是这个问题提出及讨论则可以进一步延伸到对我国人口素质特别是农村人口健康教育影响因素的探讨,这是“人口逆淘汰”问

需要同时具备三个条件:其一,乡村人口的生育水平高于城镇;其二,不存在城乡人口之间的人口流动,这里人口城镇化过程可以理解为人口素质提高的过程;其三,乡村人口自身的健康和教育素质不变。但现实中我国的城乡人口并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即存在着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和迁移,而且人口城镇化的速度要高于乡村人口的增加速度;另一方面,乡村人口自身的健康和教育素质也随着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提高。正是因为这三个条件在我国没有同时成立,所以在人口的宏观指标并没有发现我国总人口出现“逆淘汰”现象。

题背后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再次反思“人口逆淘汰”问题意义重大。

2. 城乡社会“断裂”现象

20世纪 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相对于 20世纪 80年代改革开放惠及全社会,20世纪 9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加速,且出现了社会发展的严重“分化”。针对这种社会阶层、地域发展等差距拉大,一些学者提出了社会断裂的概念,并认为“断裂”是 20世纪 9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突出的特征。孙立平教授认为,所谓“断裂”,是一个社会结构的概念,是社会发展中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社会断裂至少包含三个层次的含义:其一是社会等级与分层结构上的“断裂”;其二是城乡之间的“断裂”;其三是文化及社会生活方面的“断裂”。断裂社会的实质是几个时代的成分并存,但相互之间又缺乏联系。^[7]

对于城乡社会的二元结构,孙立平教授的研究进一步指出,现存的户籍制度、城乡不同资源配置制度以及城乡壁垒不仅造成了城乡社会之间的“断裂”,而且造成了城乡社会身份的歧视。^{[8] (94)} 户籍制度影响了人口的正常流动,农村工业化、城市化受阻,农民被甩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之外;不同的资源配置制度扩大了城乡差距,教育健康资源配置呈现两极化;城乡壁垒则加剧了城乡社会之间的“裂痕”,广大农村和农民无法顺畅地

进入现代化社会,而即使那些已经流入城市的流动人口,也很难真正融入到城市的主流社会中。孙立平教授认为,当代城乡之间形成了“新二元结构”。改革开放以前的城乡二元结构是以户籍壁垒为基础形成的“行政主导型二元结构”,以行政的手段维持了“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制度”,“将城乡两部分居民分成了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而在当代,我们正处于“从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消费的时代到耐用品生产和消费的时代”,“城里人的支出,很难流入到农村去”,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和农村之间一种新形式的断裂,这种断裂主要不是由人为造成的,而是由市场造成的(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结构)”。^{[8] (107)}可以说,由过去“行政主导”遗留下的历史问题如户籍制度还没有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又产生了新的城乡社会“断裂”,新老问题叠加,加剧了我国业已存在的城乡社会二元结构问题。

从城乡社会“断裂”这样一个研究视角,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城乡二元社会在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的确经历了差距缩小到从小到大、再到更大的过程。如1980年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相对比为2.50(城镇比乡村),到1985年缩小到1.86。不过,到1990年,差距不是继续下降而是开始扩大,到1995年高达2.71,超过了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的水平。2005年超过了3,在2008年8月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农业部相关人士在《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稳定增收情况的报告》中指出,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实现了1985年以来的最高增幅,但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大的一年。2007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扩大到了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9]若以国际上常用的恩格尔系数(是指食品支出总额在家庭消费支出总额中的比重)来衡量我国城乡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状况,城乡社会的差距始终存在。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我国城市和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是57.5%和67.7%,分别处在贫困和温饱阶段;到2006年,城乡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5.8%和43.0%,分别处在富裕和小康阶段,都在进步,但还未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

城乡社会“断裂”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还表

现在教育、健康等社会发展方面,人口素质的国家资源再分配上依然存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巨大差异。以城乡教育、医疗卫生投入为例。我国学者研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旧有的城市和农村地区教育和医疗公共产品供给机制被逐渐废弃,城乡社会不平等程度都有所加深。特别是城乡社会二元差距原本很大,而且还在继续扩大。^[10]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始终处在投入不足的状况,本来就属于低水平,而国家资源再分配时,农村仍低于全国水平。农村医疗卫生费用的投入也是如此(见表6),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乡医疗卫生费用的投入始终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这种差距并没有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缩小,而是持续存在。

以上的统计事实说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不可否认,在分享发展成果中,乡村人口处于“弱势”群体,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许多方面,城乡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城乡社会的“断裂”在继续,“裂痕”在扩大。

表6 全国城乡人均卫生费用投入(元)

| | 1990 | 1995 | 2000 | 2005 |
|-------|-------|-------|-------|--------|
| 城镇 | 158.8 | 401.3 | 812.9 | 1122.8 |
| 乡村 | 38.8 | 112.9 | 214.9 | 318.5 |
| 城镇/乡村 | 4.09 | 3.55 | 3.78 | 3.53 |
| 城镇-乡村 | 120 | 288.4 | 598 | 804.3 |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2007中国卫生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7.

事实上,早年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在其著名的《第三次浪潮》中,对信息社会的“断裂”曾有一番预见;而2001年托夫勒再次来到中国看到中国的巨变时,又一次阐述了关于社会“断裂”的思想,他指出,中国的国情非常复杂,生活着三种不同“世界”的人。大约有7亿至9亿的农民生活在属于“第一浪潮”的世界里,即还停留在农业社会,他们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2.5亿至3亿人口生活在“第二次浪潮”之中,他们还属于大生产的工业社会。中国只有极少数人跨入了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第三次浪潮”,这些人口不超过1000万人。托夫勒认为,这样复杂的国情对中国政府来说是个相当大的难题。因为,每一个不同的社会组成部分,它都有不同的要求。更何况中国又有如此庞大的人口。^[11]在未来的1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中国的三代“浪潮”比例会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发生历史性巨变,这对于我国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3. “人口逆淘汰”问题再思

固然从人口的总体分析并不存在所谓的“人口逆淘汰”问题,但并不意味着我国全民素质提高不存在问题。通过城乡二元结构视角的分析,我们看到城乡之间的水平、垂直流动受到多种制度的“制约”,而且国家在人口健康与教育投入上城乡也有很大差别,这些都极大地影响了我国人口素质的全面提升。至少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入的再思考。

其一,需要检讨城乡二元制度的“弊端”以及新时期社会“断裂”产生的新机制,加速破除历史遗留下来的、以及新兴的阻碍城乡人口水平、垂直流动的各种“桎梏”。进入 21 世纪以来,特别是 2004 年我国提出科学发展观、统筹解决城乡协调发展问题以来,我国政府对流动人口的工作方针发生重大转变,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旨在改革城乡分治的二元户籍制度,并通过清理各种针对进城民工的歧视性政策,降低农民外出就业的门槛,为农民外出就业创造公平环境,实现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顺利转移。2008 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又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文件。该文件提出,要统筹城乡社会管理,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使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目前我国已有 13 个省取消了农村户口,2 万多个小城镇放开了户籍管制。可以说,在破除城乡制度壁垒方面,近几年我国各级政府出台了许多相关政策。不过,城乡社会的“裂痕”依然存在,依然难在短时期内将城乡社会的“断裂”“弥合”。如农民向城市转移中如何被城市所容纳,特别是如何接纳民工子女,让移民的第二代成为城市人而不被边缘化、歧视化,这些问题需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实际上,今日西方发达社会出现的一些与移民有关的问题值得借鉴,西方社会如 2005 年法国巴黎骚乱直接与移民的歧视、教育、失业、不能融入法国主流社会有关,而 2008 年冬季希腊社会年轻人骚乱的背后也有第二代移民问题的影子。我国正处在人口城市化加速的进程之中,一方面我们需要尽快破除各种制度“壁垒”,同时,更要破除心理、观念上的“壁垒”,加速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加快弥合城乡社会“断裂”。

其二,树立从“人口大国”转向“人力资本大国”发展战略。在当今全球化竞争时代,中华民

族要立于强国之林,必须快速实现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大国、强国的转变。近些年,我国在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大国转变的过程中,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有关部门新近的一系列数字表明,我国的教育发展正使我国从 13 亿人口大国转化为人力资源强国。教育部门的有关人士指出,目前,我国已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特别是实现农村免费义务教育。高等教育进入了大众化的阶段。2007 年,中国高校招生数达到 570 万人,毛入学率达 23%,在校生总数达到 2 700 万,位居世界第一。此外,教育公平也迈出了重大的步伐。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全部免费提供教科书,并对家庭困难的学生提供生活补助,使 1.5 亿学生和 780 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都普遍受益。同时健全了国家奖学金制度,普通高校资助面超过 20%,中等职业学校资助面超过 90%。^[12]但是,正如上述分析看到的,城乡人口无论是在健康教育素质上,还是在健康教育资源分布和投入上都存在着巨大差距。对于处于健康教育弱势的广大乡村人口,国家应该采取更大的“补偿性”政策,加大对乡村地区和乡村人口的教育健康投入,才能有效地减少不公平,才能更快地缩小城乡这种差距。目前,我国教育健康等公共支出的力度仍有加大的余地,与一些发展中大国相比,我国在这方面仍有不小的差距。只有乡村人口特别是中、西部农村人口的健康教育素质全面得到提升,才能实现全体国民人口素质的提升,才能真正实现我国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大国的转变。

其三,从人口生育政策角度看,重要不是检讨为什么允许农村育龄人群有比城市相对“宽松”的计划生育政策。重要的是,在当今社会经济发展及人口的新形势下,还有没有必要再做这种人口生育政策上的城乡二元区分。需要检讨的是维持这种严格生育政策背后的依据和发展理念。在强调以人为本,贯彻科学发展观,统筹解决城乡人口问题的今天,一方面我们要正视城乡各种发展资源的差异,强调政策要向乡村、特别是中、西部农村地区倾斜;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基本的公民生育权利,需要更大的生育选择空间,以消除城乡生育权利的差异。因此,重要的不是苛求乡村人口要像城市人口一样实施严格的生育政策,而是全民需要实施更加宽松的人口生育政策。

四、小结

从上述的研究分析, 让我们看到了人口学统计数字背后的社会现实。虽然, 我国人口总体的健康教育水平在不断提升, 不存在所谓“人口逆淘汰”问题, 但是我们看到了我国城乡社会“断裂”的现实。在这城乡社会“断裂”的背后, 城乡人口不仅在户籍上、在享有的教育、卫生、福利等方面权力上存在着显著差别, 同时, 城乡社会的教育、卫生等公共资源投入和配置上也存在着差别, 而且这些城乡差别并没有因为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而缩小。2009年4月在有关部门主办的关于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研讨会上, 专家指出, 我国的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 已经影响到我国教育事业的正常发展。早在1993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明确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 在本世纪末达到4%。”但迄今为止, 教育投入占GDP4%的政策目标提出16年了, 仍未实现。^[13]显然, 未达标的“受害群体”首当其冲是乡村人口, 直接影响了这部分人群的健康和教育素质的提高。上述诸多阻碍我国人口特别是农村人口素质提高的因素, 大大地影响了我国全民素质的提高, 影响了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大国的转变。只有正视和解决这些问题, 才能实现社会和谐发展, 才能实现人口现代化。

[参考文献]

- [1] 王久仁. 中国人口素质将呈现相对下降趋势[J]. 社会科学研究, 1989(3): 54-60
- [2] 周孝正. 论人口素质的逆淘汰[J]. 社会学研究, 1991(3): 25-32
- [3] 李训士. 我国人口素质并未出现逆淘汰——与周孝正同志商榷[J]. 社会学研究, 1992(6): 35-39
- [4] 侯东民. 对我国人口素质“逆淘汰”问题讨论的几点看法[J]. 社会学研究, 1993(2): 36-42
- [5] 翟振武, 侯佳伟. 人口逆淘汰: 一个没有事实根据的假说[J]. 中国人口科学, 2007(1): 10-18
- [6] 刘铮. 人口学辞典[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6: 24-25
- [7] 孙立平. 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5
- [8] 孙立平. 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94-107
- [9] 袁场.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近30年最大, 农业部部长详述破解之道[N]. 第一财经日报, 2008-08-29(A3).
- [10] 张晓波. 教育和医疗卫生中的不平等[J]. 经济学(季刊), 2003, 2(2): 405-416
- [11] 梅绍华. 学者托夫勒: 对中国3大预测和对世界4新预言[N]. 经济日报, 2001-12-10(5).
- [12] 吴月辉. 中国成为人力资源强国[N].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8-08-17(1).
- [13] 李新玲, 樊未晨. 教育经费投入, 不差钱? [N]. 中国青年报, 2009-04-25(2).

[责任编辑 傅 苏 王晓璐]

Rethinking to the Rupture of Urban and Rural Social Structure and Population Adverse Selection

LI Jian-xi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of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Population Adverse Selection" is a problem that already had an explicit conclusion in demographic studies, but from a sociological point of view,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further reflection. This article makes a review of development of demographic research, re-analyzes and re-thinks "Population Adverse Selection" issue from perspective of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It is indicated that in a Fractured Society, behind the "social statistics fact" of difference in population quality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China, institutional factors, such as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structural factors, such as the possession and allocation of education and health resources, have affected the improvement of China's population quality profoundly.

Key Words Population Adverse Selection,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population quality